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敦煌变文和

王梵志诗

刘子瑜 著 蒋绍愚 审定



大象出版社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

王梵志诗 敦煌变文
王梵志诗 敦煌变文
王梵志诗 敦煌变文

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

敦煌变文和王梵志诗

刘子瑜 著

蒋绍愚 审定

责任编辑 宋士杰

大象出版社 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编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625印张 110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325册

ISBN7-5347-2057-5/Z·92

定 价 6.55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袁行霈 吴同瑞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光辉灿烂,曾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过重大贡献。今天,当历史车轮进到 20 世纪和 21 世纪交替的年代,中国人民又肩负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历史使命。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有重重困难,也有种种有利条件。充分利用丰富的文化宝藏,对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传统美德教育,就是我们的一大优势。毫无疑问,普及祖国的历史知识,宏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向社会提供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将对提高中华民族的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积极意义。有鉴于此,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与大象出版社携手合作,共同推出“中国历史文化知识丛书”。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北京大学具有研究和宏扬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和优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学校领导于 1992 年初决定成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依托中文、历史、哲学、考古等系,组织各方面的教师和专家开展工作。一方面,致力于专深的学术研究,编辑出版《国学研究》年刊和《国学研究丛刊》;另一方面,注重于文化

普及工作，“将大学课堂延伸到社会”。与有关单位合作制作的电视系列片《中华文化讲座》和《中华文明之光》，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编写这套丛书是中心普及工作的又一尝试。中心希望丛书的作者们“眼界向上，眼光向下”，用大手笔写通俗性著作，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并重，力求深入浅出，使广大读者增长知识，陶冶情操。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产物，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加以区分不行；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曾经发生并将继续发生交流、碰撞与融合，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纵览古今、通观世界的眼光不行。我们抱着历史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前瞻的态度、开放的态度，从事发掘与研究工作。这种态度也力求贯彻到本丛书中。然而，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的选题只能侧重于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那些目前尚未充分注意的学科如法律思想史等，也适当予以注意。

从选题和内容来看，这套丛书可分为文学、语言、历史、哲学、考古、法律、科技、中外文化交流等若干系列，每个系列都由研究中心聘请学术造诣较深的专家担任主编，每部书稿都经同行专家审阅。因此，中心不再对丛书作统一的审定工作。

大象出版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们非常重视这套丛书，把它列为重点出版书目，并为丛书的及时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辛勤的劳动，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丛书的策划、编写工作一定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一、敦煌和敦煌文学	1
(一)敦煌和佛教东传	1
(二)敦煌莫高窟和敦煌艺术	7
(三)石室遗书的发现和被劫经过	12
(四)敦煌学和敦煌文学	15
二、敦煌变文	29
(一)佛教传播方式的文学艺术特性	29
(二)变文的产生和繁荣	35
(三)变文的题材和思想内容	48
(四)变文的艺术成就	59
三、王梵志的白话诗歌	69
(一)湮没千年的敦煌诗歌	69
(二)王梵志及其五言白话诗	82
(三)王梵志诗歌的思想内容	91
(四)王梵志诗歌的艺术特色	103
四、敦煌变文、王梵志诗的文化渊源和 文化特色	112
(一)敦煌变文、王梵志诗产生的文化	

背景	112
(二)敦煌变文、王梵志诗与中国文化传统	116
(三)敦煌变文、王梵志诗的佛教渊源	127
(四)敦煌变文、王梵志诗的语言特色及价值	135
(五)敦煌变文、王梵志诗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163
结束语	170

— 敦煌和敦煌文学

(一) 敦煌和佛教东传

1. 历史上的敦煌

在北去的黄河的西面，北山以南，祁连山以北，有一条绵延千余公里的狭窄通道。古时，这条通道上曾经商队络绎不绝，使者相望于道，它就是我国古代通往西域的必经要道——河西走廊。今天的敦煌市就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是我国甘肃省西北部的一个边陲小城。

敦煌地区的面积很大，但四周大片土地都是漫漫黄沙的戈壁和山地，绿洲面积不大。敦煌境内有两座名山——三危山和鸣沙山，它们都是祁连山的余脉。祁连山绵亘 800 公里，平均海拔在 5000 米以上，山顶皑皑积雪，终年长存。夏秋

之季，冰雪消融，雪水顺山奔流而下，滋润了山下干渴的土地，使得石砾和沙丘中出现一块块生机盎然的绿洲，敦煌就处在绿洲之上。这融雪浇灌的绿洲，给敦煌带来了神奇而永久的生命力。

敦煌是一个古老的地方。最初并不叫“敦煌”，而是因山、因沙、因盛产美瓜而被称作“三危”、“沙洲”和“瓜洲”。《尚书·舜典》载“窜三苗于三危”，《夏书·禹贡》也有“三危既宅，三苗丕叙”的话，“三危”所指到底是什么，历来学者的看法有异。《史记·五帝本纪》曰：“三危山有峰，故曰三危，俗亦称卑羽山，在沙洲敦煌县东南三十里。”晋郭璞注《山海经·西次三经》“三危之山”时亦云：“今在敦煌郡，《尚书》：‘窜三苗于三危’是也。”明言《尚书》中的“三危”乃敦煌境内的一座山，此后酈道元的《水经注》也有相同的说法。这种说法在南北朝时期广泛流传，敦煌的三危山也就被人们认定为《尚书》中的“三危”了。照此推断，《舜典》、《禹贡》大约作于战国时代，那么敦煌这个地方至少也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

战国至秦时，在敦煌一带活动的主要是羌戎、月氏等少数民族，其中以月氏最为强大。秦汉之际，蒙古高原的匈奴族渐渐发展起来，冒顿即位为匈奴单于，统一了匈奴各部，遂向西攻破了月氏，占领了河西，迫使月氏大举西迁。汉初，匈奴最为强盛，破逐月氏之后，匈奴使其部属浑邪王驻牧，敦煌等河西大片土地便成为匈奴的游牧地区。

强悍的匈奴占据河西以后，经常骚扰汉朝边境，阻塞中西交通，严重威胁了汉朝西北边防的安全。但当时年轻的汉

帝国国力虚弱，无力反击，只好用赠物、和亲等方式与匈奴求和。汉武帝时代，经过 70 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渐盛，于是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 129 年），汉武帝派大将卫青、霍去病引兵西征，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匈奴战败。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浑邪王率部投降，汉朝遂尽有了河西之地。为了进一步开发河西，保证中西交通的畅通，汉武帝在那儿设置了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个郡县，从此，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籍，“敦煌”之名也载入了史册。

汉武帝还将秦长城西延，从临洮（今甘肃岷县）延至敦煌西边的马迷兔；又在敦煌郡城西分别修建了玉门关和阳关，扼守由西域进入河西、中原的大门。武帝以后，长城和烽燧继续西延，最远一直到达龟兹国（今新疆库车）西北。与此同时，汉朝又从中原地区移民实边，驻兵屯戍，中原文明逐步渗入西北边疆，敦煌的生产和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

其时，中国已与西方国家开始了贸易往来。对匈奴战争的胜利，使得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畅通无阻。敦煌扼“丝路”之“咽喉”，是当时中西往来的门户。中国的丝绸、瓷器等商品由此输出，西方的奇珍异品也由此输入，敦煌的经济文化得以进一步发展，敦煌逐渐成长起来。《汉书·地理志》记载，当时敦煌已有 11200 户，38000 多人口。汉应劭解释“敦煌”二字时说：“敦，大也；煌，盛也。”可见，汉代的敦煌已经相当繁荣了。

隋唐时代进一步加强对西域的经营开发，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增至三条。《隋书》卷 67《裴矩传》引裴矩《西域图记序》记载当时“丝绸之路”的情况云：“发自敦煌，至于西

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可见敦煌在中西交往中的重要地位。那时敦煌的集市上，既有来自中原的汉族客商，也有来自阿拉伯、非洲、古罗马帝国、波斯、印度等国的商人，大批的行商坐贾从事着中原的丝绸、瓷器，西域的珍宝、北方的驼马和当地的粮食等各种贸易，敦煌空前繁荣，享有“华戎所交一都会”^①的盛誉。

商业的往来也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中国的丝绸、工艺品、陶瓷、铁器及中原地区先进生产技术的输出，大大推进了西方国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西域的物产，诸如葡萄、苜蓿、胡桃、骆驼等的输入，西域胡乐、胡舞、绘画、雕刻等艺术的东来，印度佛教的传入等等，也大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特别是佛教的传入，更为敦煌文化艺术的繁盛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带来了深远影响。

2.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

印度佛教大约产生于公元前6世纪末到公元前5世纪初，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又称释迦牟尼，释迦牟尼是尊称，意即释迦族的圣人。相传，释迦牟尼是净饭王的太子，生于古印度北部的一个小国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童年时受婆罗门教育，29岁出家修道。悉达太子厌世的原因，据佛书记载是因为看到生老病死诸苦相，所以决心出家修行以求解脱诸苦的方法。实际上，天竺国社会的黑暗与不安定，也是其厌世出家的重要原因。悉达太子修行的过程，

^① 《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

佛书也多有记载。据载,最初,太子出家修了6年苦行,毫无所得。有一天独自坐于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经若干昼夜,顿然领悟了人生究竟,修成无上正觉,立定成佛,这一年太子35岁。其后45年间,释迦牟尼在天竺国传经布道,广纳徒众,佛教迅速传播。

释迦牟尼在独坐冥想中所获得的无上正觉,就是所谓苦、集、灭、道四谛,这是原始佛教教义的基本内容。佛教宣传一切皆苦(苦谛),认为人生是苦海,人在生死苦海中轮回流转,永无休止。推究致苦的原因(集谛),佛教以为业是苦的正因,烦恼是苦的助因。业有身业、语业、意业三种,烦恼有贪、瞋、痴、慢、疑、见六种,因业与烦恼产生出无数苦果,要断绝苦果,就必须断绝业与烦恼。这样,修行者才能无障无缚,从轮回中解脱出来,是为灭谛。寂灭有道(道谛),道就是达到涅槃的道。佛教修行,以涅槃为终极目的,佛教以为永无止境的生死轮回是极大的痛苦,涅槃以后便能摆脱生死轮回的境界。

四谛以外,佛教还有若干重要的训条,其一是忍辱无净;其二是慈悲平等。忍辱无净就是要人忍受各种凌辱迫害以及饥饿穷困而不生怨恨,不去争斗;所谓慈悲平等就是主张对一切生命要慈爱怜悯,一视同仁,不分人畜,不计善恶,都要广施仁爱。

可以看出,以“四谛”为中心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宣传的是消极的出世思想,其目的是为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找到一条摆脱苦难生活的途径。其“忍辱无净”的训条又教人逆来顺受,安于现状;其所提倡的慈悲平等,也使得广大的下

层百姓寻求到某种精神安慰。这样的宗教宣传在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中,对老百姓有着强大的诱惑力,也正因为这一原因,历代统治者总是千方百计地利用佛教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印度本土,佛教即因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而得以迅速传播,在阿育王统治期间(前 271 年~前 235 年)便一跃而成为印度的国教,并很快向境外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

3.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

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但由于汉代商业文化占了主要地位,所以佛教最初并没有引起社会的重视。随着汉代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社会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东汉末年,农民起义连年不断,十六国时期,社会更加动荡,政权更迭无常,战争连绵,广大下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局势为宣扬人生是苦、世事无常的佛教提供了滋生发展的合适土壤。另一方面,生活的极端困苦、动荡,又使得人心厌乱,广大百姓无不渴求精神寄托以摆脱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佛教关于彼岸极乐世界的宣传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地顺应了人心,佛教因此也得以迅速传播开来。

作为“丝绸之路”的咽喉,中西交往的门户的敦煌,自然是我国汉族聚居区最早接触佛教的地方。佛教首先是在敦煌出现繁荣,然后由敦煌逐渐扩散到内地。

敦煌佛教的兴盛,首先表现在译经方面。随着佛教的传播,敦煌地区出现了不少高僧,他们不辞艰辛,跋山涉水,西行求经,归来时携回大量梵文或胡语佛经,然后从事译著,

聚徒讲经，传播佛教。如西晋高僧竺法护通 36 种语言，世居敦煌，组织了专门的译场，译经传道，号称“敦煌菩萨”；前凉时，昙无讖、单道开、竺昙猷等高僧也在敦煌修习佛法，翻译了大量佛经。佛典的传译为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佛教活动的扩大，佛教徒们需要有固定的场所礼拜佛，修法布道，敦煌鸣沙山下的沙漠绿洲为他们提供了理想场所。于是佛徒们就在鸣沙山下流水萦回、草木葱郁的沙漠绿洲上开凿洞窟，修建佛寺，举世闻名的敦煌莫高窟就这样诞生了。

（二）敦煌莫高窟和敦煌艺术

1. 深藏在沙漠中的艺术宝库

敦煌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的悬崖峭壁上。传说在前秦建元二年（晋废帝太和元年，即公元 366 年）的一天，一个叫乐僔的和尚，西游至敦煌的三危山脚下，时值黄昏，太阳快要沉入茫茫无际的沙海之中。乐僔遥礼三危，抬头忽见三危山为一片金光笼罩，金光之中仿佛有千佛的身影隐现。乐僔被眼前的奇观炫惑了，以为自己身处佛家圣地，于是就募人在山脚下开凿了一个洞窟，莫高窟的第一个洞窟就这样诞生了。后来又有一个叫法良的和尚来到这里，在乐僔洞窟的旁边又新开一窟。以后不断有人在此开凿洞窟，每个洞窟的里边都绘有佛画，立有佛像，以便信徒们瞻仰礼拜。到唐代，

400年间,洞窟已发展到1000多个,莫高窟千佛洞因此而得名。这个记载见于唐代武周圣历元年(公元698年)李怀让《重修莫高窟佛龕碑文》和唐咸通六年(公元865年)正月十五日《莫高窟记》写卷,材料大致是可信的。据此可以推断,大约在4世纪左右,莫高窟已经开始凿建了。

莫高窟本是佛教信徒们礼佛拜佛、修习佛法的场所,然而每个洞窟四壁所绘的佛像图画以及洞内的妆彩菩萨塑像本身又是精美无比的艺术珍品,这些艺术精品又使得佛教圣地莫高窟成为一座多姿多彩的艺术宝库。继东晋时开凿了第一个洞窟以后,历代都有兴建和修复。特别是唐代,佛教繁盛,封建文明也达到极盛,莫高窟进入了历史上的灿烂时期,洞窟的数量和艺术水平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艺术家们在悬崖峭壁上凿建出一座座艺术殿堂,雕檐画栋,彩笔纷华,莫高窟盛景辉煌一时。但到唐末和北宋以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西北少数民族回鹘、吐蕃等乘乱骚扰西北边疆,波及到敦煌。其时佛教渐衰,特别是唐宋以后海运商道的日渐开辟,经济中心南移,敦煌逐渐失去了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的重要地位,莫高窟往日的繁华也因此黯淡下去。元代以后开凿的洞窟为数寥寥,艺术上也无甚新意,至此莫高窟艺术已达尾声。入明,朱氏王朝无力管辖西域,敦煌一带边远地区,几乎与中原隔绝。莫高窟从此静卧于西北边陲的荒漠中,为人们所淡忘。

莫高窟这座深藏在沙漠中的艺术宝库,从公元4世纪开凿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道路。1600年来,她有过兴盛和繁荣,也经历了战争的冲击和大自然的风蚀,不少洞窟因

此而被毁坏。但终因其僻处边陲，历代中原战争很少波及，加之佛教信徒的尊崇爱护，所以侥幸得以保存下来。但是，自然界风沙烈日的侵蚀，边疆战火的蔓延，外教及无知者的破坏，西方列强的剥窃偷盗，仍使得莫高窟伤痕累累，许多洞窟甚至毁于一旦。据统计，莫高窟现存较为完整的洞窟492个，其中包括妆彩塑像2400余身，壁画45000余平方米，岩壁上还有五座唐宋时代的木构建筑。492窟中，可以判明时代的洞窟，魏窟23个、隋窟95个、唐窟213个、五代窟33个、宋窟98个、西夏窟3个。各时代的石窟艺术在色彩、线条、造型诸方面各有特色，它们一起构成了敦煌莫高窟这座完美辉煌的艺术宫殿。

莫高窟是敦煌艺术宝库的主体，此外还有位于敦煌城南75里、党河北岸的西千佛洞，安西城南的榆林窟（万佛峡）和水峡口的小千佛洞。这四处石窟群开凿年代大致相同，洞窟的形制和艺术风格也属同一系统，不过其他三处洞窟规模小，艺术成就及保存完整程度都不能与莫高窟媲美，加之莫高窟后来又发现了震惊世界的历史文献，因此莫高窟成为研究敦煌文化和艺术的中心。

2. 敦煌莫高窟艺术

塑像和壁画构成了莫高窟艺术的主体。莫高窟现存彩色塑像2400多躯，因时代不同，塑像的风格也有差异。最早的彩塑是北魏时代的作品，此期的塑像，面貌清癯，线条刚健有力，看得出浓重的西域艺术风格。隋代塑像面部丰满，体态丰腴，衣褶的线条也柔和自然，开始表现出中华民族自己的风格。唐代是彩塑艺术的极盛期，这一时期的塑像，面

貌慈祥、温和、庄严、镇定，衣褶的线条更加柔和流畅，体态更加圆润丰满，集中地体现出唐代艺术所普遍崇尚的“浓丽丰厚”的时代风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高窟最大的几尊塑像都是唐代完成的，如第96窟的坐佛高达33米，是倚仗山崖凿塑出来的，外面用了一座九层楼才把它罩住。气魄之宏大，亘世少有。五代、宋以后的塑像，造型笨拙，缺乏生气，许多塑像的造型落入程式化，反映出莫高窟艺术的衰颓。

莫高窟的壁画更是绚丽多彩，包括佛像、佛传故事、本生故事及因缘故事图、经变图、佛教史迹画、供养人像和装饰图案等。佛像是佛和菩萨的神像；佛传故事图是描绘佛祖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的图画，如乘象入胎、夜半逾城等；本生故事图描绘的是佛祖前生的各种善行，如萨埵王子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喂鹰、九色鹿舍己救溺人等等；因缘故事图则是描绘佛祖度脱众生的故事画，诸如佛弟难陀被迫出家，波斯匿王丑女变美等等；经变图是将各种经文故事绘成图画，如维摩诘经变、弥勒经变、报恩经变等等；佛教史迹画是根据史籍的记载描画而成，有佛教圣迹、高僧事迹、感应故事、戒律画等等。这些都包含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中也不乏宗教幻想和虚构的情节，如张骞出使西域图，就事件本身是历史事实，但出使大夏问佛号则为虚构，虚构的情节有的是中国本土的，有的则是西域传入的。供养人像是出资开窟的善男信女们的画像，他们为自己画像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功德，祈求神佑，以得永生。图案主要作为装饰之用。

早期壁画以佛、菩萨像、佛传故事及本生故事图为主，经变很少，这大概是由于佛教东渐不久，各种佛典刚刚翻译